

据统计,2014年,有40位省部级以上高官被查处,副国级以上官员4人,因为这些高官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所以公众除了对铲除“大老虎”拍手称快以外,同样关心的是这些职位的继任者人选。

谁来担起落马高官的空岗重任?

来源一:内部调整

因为官员落马事出突然,所以一个熟悉本地工作情况的干部是平稳过渡的合适人选。

2013年6月落马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是一名60后少数民族干部,接替他统战部部长并进入党委常委行列的也是自治区内部的蒙古族干部布小林。布小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出身名门,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阿拉善盟委书记。2008年1月后一直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直到2014年1月接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2014年7月,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因严重违纪受到“断崖式降级”,被取消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接替赵智勇的是抚州市委书记龚建华。龚建华,江西南昌人,早期一直在江西省农办工作,1996年任江西省农办副主任,2000年出任南昌市副市长,随后任南昌市委政法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宜春市市长,抚州市委书记。从机关到地方,履历丰富,年龄正当时。

来源二:分工兼任

2014年4月,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落马;年末,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两名“东北虎”相继落马。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任机构正职的同时,又都兼任更高一级机构的副职。在相继落马之后,这些职务也都有相应级别的干部来接任。

接替毛小兵西宁市委书记的王建军是比较少见的高配型。王建军,湖北郧县人,曾任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秘书长。2007

年1月至2011年12月曾任西宁市委书记。而在毛小兵落马后,王建军二度“回炉”,以青海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西宁市委书记。

接替隋凤富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职务的是王兆力。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是一个正厅级职务,王兆力1962年生人,此前任黑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鸡西市委副书记、市长,2011年任佳木斯市委书记。在黑龙江省十一市一地区党委书记中,他历任两市市委书记,是唯一有此类轮岗经历的干部。

在公布韩学键落马消息的第二天,赵铭担任“救火队长”继任大庆市委书记。赵铭是少数民族干部,此前有过6年的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经历,2013年任鸡西市委书记。此番调整,黑龙江省有鸡西、佳木斯两市市委书记职务空缺。

来源三:交流空降

省级常委可谓是地方最有实权的职位,也是腐败案件的高发职位。2014年,山西省接连五名常委落马,塌方式腐败引发官场地震。随后,中央紧急对山西省委常委班子进行大幅“重组”,一日内新进五人,并由中纪委会常委黄晓薇出任纪委书记。

值得关注的是,新任的五名常委都由异地调入或“空降”而来: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楼阳生接替金道铭任山西省委副书记,重庆市委常委吴政隆接任太原市委书记,山东省副省长孙绍骋接替白云出任山西统战部部长;王伟中此前任科技部副部长,付建华此前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

有分析指出,异地任职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很好的避开熟人,跳出熟人圈子。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走关系、拉关系,做起事来“碍手碍脚”的不利局面。异地“空降”任职对于预防和打击腐败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仍有一些空缺职务有待“补位”

高官落马事出突然,很多职务虽然仍有继任者“火线上阵”,但有部分职位还依旧处于空缺状态,需要合适的人选来补位。在这些职务中,不乏有省级党委常委、地市党政一把手等重要岗位。

据记者观察,因高官落马而空缺的正省部级岗位有三个:分别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2013年12月被查处,但2014年四川省政协会议并未补选政协主席)、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2014年11月被查处)、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何家成2014年10月被查处)。

目前的副省部级正职(或唯一副职)需补岗位有3个:分别是海南省常务副省长(谭力于2014年7月被查处)、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孙兆学2014年9月被查处)、济南市委书记(王敏于2014年12月被查处)。这些职务的继任者尚未有官方消息披露,预计相应调整还将继续。

据记者观察,在被查处官员中,以地方人大、政协落马官员居多。现行人大和政协的相关规定中,并未有对副职具体职数做出明确规定。

但据组织系统人士向记者透露,人大、政协的职务调整一般在当地下一年召开的人大、政协全体会议上有所变化,但因各省区情况不同,领导职务数量也有所区别。因此,除了正职和常务副职,人大、政协的职位变化情况还另需观察。

(据人民网)

贪官落马后算账

受贿200万损失280万

忏悔人:陈勇

原任职务:云南省永善县墨翰乡党委书记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4年12月4日,永善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陈勇有期徒刑十四年。

犯罪事实:2012年至2014年,陈勇在任墨翰乡乡长、党委书记的两年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为两名工程建筑商谋取利益,先后五次收受二人贿赂225万元人民币。

陈述:小时候家庭贫困,父母为供我上学省吃俭用。每每想到父母,我就更加发奋读书。大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永善县黄坪乡农机站。在组织的培养和关心下,我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直至担任墨翰乡党委书记。

2011年,工程建筑商蒋某承揽了墨翰乡林堰渠工程。第二年9月,蒋某送给我5万元钱。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送钱。他把钱送到我的宿舍时,我拒绝过,但他坚持把钱放在沙发上就走了。我既害怕被人发现断送前程,同时又抱着侥幸心理。但最后,我还是收下了这笔钱。从那以后,我就管不住自己了。到案发时,我收受贿赂共计220余万元。

被立案侦查后,我将收受贿赂的事情全部交代了,同时也想了很多。算算亲情账、经济账、政治账,可以说,收受贿赂、触犯刑律给我带来的损失很惨重。

亲情账。以前工作虽然忙,但想家人的时候,我能和他们见见面、吃吃饭、聊聊天,享受天伦之乐,只是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拥有家庭是最重要的、最幸福的。现在我才意识到,回不到亲人身边,无法与家人团聚。

经济账。我现在的年收入4万多元多一点,并且工资在逐年上涨。我应该还可以活40年,假如每年按平均收入7万元计算,将来国家要发280万元给我,比我收受的贿赂多得多。我收受的贿赂已全部退还,现在可以说触犯法律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一对比,我经济上至少损失280多万元。

政治账。以前在领导岗位的时候,我可以为群众办事、为群众服务。每当我为群众做了一点事情,群众给我一句感谢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满足的。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从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干部变成了一个为人不齿的罪犯。

所以,我劝告领导干部们,以我为反面典型,从我的身上吸取教训。现在我明白了,却已经晚了。

(据《检察日报》)

十八大后年均落马高官为之前10多倍

数量巨大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5年间,据公开资料统计,共查处省部级以上高官205名。党的十八大之前的63年内,因涉嫌腐败犯罪或严重违纪违法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为145名,平均每年有2.3名高官被查处、落马;党的十八大之后,两年多时间内因涉嫌犯罪或严重违纪违法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达68名,平均每年有34名高官被查处,年均落马高官数量为十八大之前的10多倍。

时间集中

从2012年12月2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至2014年12月2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孙鸿志被调查为止,在短短25个月时间里,68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平均每个月多达2.72人。

在2013年中,落马高官数大致保

持按月递增,12月更是到达顶峰的6名;2014年,除1月份无高官落马外,每个月都保持至少3名以上高官落马,较之2013年同期落马高官数又有大幅提高,高官落马时间之集中,前所未有的。

山头林立

高官腐败呈现出的一个新特点就是高官之间帮派盛行、山头林立。一些落马高官利用职务便利与在官场的“影响力”,大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形成利益共同体。在这些落马高官中,极具代表性的有“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

覆盖面广

68名落马官员的地域分布中,中央机关占到了13名,所占比例高达21.7%。天津、重庆作为直辖市,分别有1名高官落马。其他省份中,山西、四川、江西3省被查处人数“名列前茅”。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2名国企高官被查处,更是体现出反腐覆盖面之广。68名高官分别来自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占34个省级行政区的70.6%。反腐之风吹遍全国各地,昭示着“打虎”反腐的全面开展。

级别特高

新中国成立起至党的十八大之前,因贪腐问题落马的国家级高官仅4人,且都属于副国级官员。十八大后的两年间,落马高官中已有4名国家级高官。其中周永康为正国级,徐才厚、苏荣、令计划为副国级。落马高官级别之高,突出体现了中央反腐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朴素理念下,只有高官中的腐败分子少了,基层官员中的廉洁楷模才能越来越多。

(据《检察日报》)